

胡風反革命理論活動 的過去與現在

曾彥修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胡風反革命理論活動 的過去與現在

曾彥修著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五六年・北京

胡風反革命理論活動
的過去與現在

曾彥修 著

人民出版社出版 (北京東總布胡同10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1號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開本787×1092公厘 $\frac{1}{32}$ ·印張1 $\frac{5}{8}$ ·字數36,000

1956年4月第1版

1956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1—11,000 定價(7)0.16元

統一書號：3001·428

出版者說明

这本小册子的前面四節，曾經在一九五五年七、八月的“文藝報”上發表過，這次印成單行本，由作者作了修改。此外，作者還增寫了在本書中比較重要的第五節，分析了胡風思想的本質和它的階級性。

在反对和肅清胡風反革命集团的鬥爭開展以後，有一些別有用心的人、道听途說的人、或者被欺騙的人在傳播着种种怪論。他們說，胡風現在是反革命無疑了，但是胡風過去是“反蔣”的，有過“功績”；或者說胡風是“兩面開弓”，雖然反共，但是也“反蔣”；或者說胡風雖然宣傳了錯誤的文藝理論，但是也宣傳過馬克思主義的文藝理論等等。總之，要說明胡風並不是從來就是反動的，而且，似乎還曾經對革命有過什麼貢獻！

有些年輕天真的人或在政治上十分幼稚的人，就很容易上這些反動“理論”的當。因此，把二十多年來胡風的反革命理論的活動加以徹底的揭發，就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國民黨在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的“剿共”戰爭中，對革命用了兩種“圍剿”，即軍事“圍剿”和文化“圍剿”。結果是，如毛澤東同志所說：“兩種‘圍剿’都慘敗了。……其中最奇怪的，是共產黨在國民黨統治區域內的一切文化機關中處於毫無抵抗力的地位，為什麼文化‘圍剿’也一敗塗地了？這還不可以深長思之麼？而共產主義者的魯迅，却正在這一‘圍剿’中成了中國文化革命的偉人。”（“新民主主義論”，載“毛澤東選集”，第二版，第二卷，六九五頁。）這一段話對於我們了解胡風問題的本質和根源是有很大的幫助的。大家知道，在那十年中，直接在國民黨支使下面的，有所謂“民族主義文學”運動，文學上的“自由人”、“第三種人”運動和一般的所謂“中國本位文化建設”運動等等。這些運動，都轉眼就被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進步文藝運動和文化運動所擊敗了。但是他們有他們所擅長的特務工作。他們知道要破壞進

步文化活動，除了焚書與殺人之外，還必須派遣反革命分子以偽裝進步的姿態打入共產黨和進步文化陣營裏來進行“挖心戰”。例如，在一九三〇年前後，托洛茨基分子葉青等人就被僱傭來進行這種勾當，他們以馬克思主義的詞句激烈地反對馬克思主義。胡風也就是擔任了這類的角色，在左翼文化界活動了二十年。他所進行的全部反革命活動，是有他的政治背景的。什麼“馬克思主義”、“主觀戰鬥精神”，都不過是胡風執行蔣介石的反共政策的武器罷了；而胡風為什麼總是以魯迅作招牌來騙人，從上面毛澤東同志的話裏也可以找到說明：原來這也是反革命的“擒王”戰術。因此，挑撥魯迅和黨的關係，歪曲魯迅，這也就成為胡風反革命活動的重要任務之一。

以下讓我們分期的（抗日戰爭以前、抗日戰爭的前半期、抗日戰爭的後半期、抗日戰爭勝利至解放前、解放以後）來揭露胡風二十多年來反革命的理論活動及其實質。

—

先說抗日戰爭以前。

胡風在江西“剿共”之後，到了日本，一九三三年回到上海，立刻就寫了一篇“辯證法與江湖訣”的雜文，大罵用辯證唯物主義來研究科學的人。胡風說，當他的一個朋友告訴他想用辯證法來整理中國的醫學時，“我不禁失聲地笑了出來。他馬上正色地說：‘笑什麼？為什麼不能用辯證法來整理醫學？’——是的，為什麼不能用辯證法來整理醫學呢？我想，有一天，也許有一天，時裝公司會用‘辯證法’來剪裁時裝的。”^①讀者看，這時的胡風，並沒有能夠完全掩飾他是馬克思主義的正面敵人。

① 見胡風的雜文集“蕪源草”，一九四七年上海希望社版，一四頁。

漸漸地，胡風就利用起“馬克思主義”來了。一九三五年，胡風寫了一篇“什麼是‘典型’和‘類型’”的文章，大談其“馬克思主義”的文藝理論。說典型“含有普遍的和特殊的這兩個看起來好像是互相矛盾的觀念。然而，所謂普遍的，是對於那人物所屬的社會羣里的各個個體而說的；所謂特殊的，是對於別的社會羣或別的社會羣里的各個個體而說的。”^①並滑天下之大稽地說阿Q這個典型的特殊意義，就在於他和“商人羣地主羣工人羣”的不同云云。讀者看，那時的胡風，大概還沒有得到像謝韜這類的人作他的理論顧問，所以玩弄起“馬克思主義”來不免大露馬脚！在另一篇文章中胡風又特別藉口要創造典型，來反對九一八後為政治服務的文藝作品，說那些通通是“標語口號”，沒有寫出典型，因此毫無價值^②。當時，周揚同志曾客氣地指出胡風的這一個常識以下的錯誤，並特別指出“目前重要的是要克服文學落在現實的後面，作家和實踐隔離的那可悲的狀態，要使文學成為民族解放的武器之一。因此，反映這個解放運動的事實的小形式的文學作品不應當得到低的評價”（“文學”，一九三六年四月號）。這正擊中了胡風的痛處，因為它接觸到了胡風的騙子和敵人的真面目的問題，因此胡風以後懷恨到底，有機會就罵。

胡風在抗日戰爭前最大的一次破壞活動，是一九三六年在魯迅先生和黨的關係之間進行挑撥離間，並且挑撥了魯迅先生在一个短時期內与一部分黨的作家之間的親密關係。事情是这样的：在一九三五年“一二九”運動前後，當時一部分在上海的黨員作家和非黨進步作家，為執行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綫政策，提出了一個團結一切有愛國感的各派作家的“國防文學”的口號，

① 見胡風抗日戰爭前的論文集“文藝筆談”，一九四三年桂林國光出版社版，一〇六頁。

② “現實主義底一修正”，載“密雲期風習小記”。

这个正確的口号在幾個月之內，就完全流行起來，得到了文藝界的廣泛的擁護，郭沫若先生並曾对这口号的內容作了確當的解釋和說明。這時左翼文化界又提出了一個立場比較更鮮明、適合於左翼作家的“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口号，來和具有廣泛統一戰綫性質的“國防文學”的口号相輔而行。鑽進進步文學界裏進行破壞活動的胡風立刻利用這個機會，寫了一篇叫做“人民大眾向文學要求什麼？”的文章（一九三六年五月）來“解釋”這個新的口号。在這篇文章中，胡風對已經成立和流行的“國防文學”的口号一字不提，而且故意加以抹煞，其用意，一方面是抗拒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的政策，另一方面是藉此製造進步文藝界的分裂和糾紛，以破壞當時已經走向開展的文藝界的抗日大團結的運動。那時，在“國防文學”的口号才一提出的時候，托洛茨基分子立刻就嗅出了這是黨的團結抗日的口号，他們馬上就對這個口号進行了猛烈的、超“左”的攻擊，說這是出賣工農，是掉入了“愛國主義的污池”等等。而胡風的上述具有挑撥性的文章，就正是與國民黨奸細托洛茨基分子裏應外合的反革命行動。因此，很快地，茅盾、郭沫若諸先生就相繼對胡風進行了批評和指責。茅盾先生說：“大概一個月以前，胡風先生在文學叢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把‘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作為現階段文學運動的口号提了出來。然而胡風先生只把這概括的總的口号葫蘆提了出來，而沒有指明，為了要和現階段的民族救亡運動的要求相配合，還應當有更具体的口号——‘國防文學’。胡風先生那篇文章顯然還有以‘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一口号來代替‘國防文學’一口号的目的。”並稱這是胡風的“顯然的錯誤”（“關於‘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載“國防文學論戰”，一九三六年上海新潮出版社版，二六二、二六三頁。）。再過一個月，即七月，茅盾先生對胡風及擁護胡風的聶紺弩等人作了更深刻的揭發，說

他們“曲解了魯迅先生的意思”，而且“首先是那位曾在魯迅先生處聽得了這口號的胡風先生，竟拿‘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這口號來與‘國防文學’的口號對立。他把本來只對左翼作家而發的口號變成了對一般作家，‘左’誠然是‘左’了，但那道‘門’却關得緊緊的了，因而也是十足的宗派主義的作風”（“關於引起糾紛的兩個口號”，載同上書，三四一頁）！

胡風一鑽進進步文學界來活動的時候，就主張搞小圈子主義。就在胡風發表上述那篇挑撥性文章的同時，胡風又寫了一篇不三不四的所謂“文學修業底一個基本形態”的論文，內容只有一點，就是全力地宣傳：文學事業要發展，唯一的依靠就是辦一些幾個人一夥的所謂同人雜誌。並且荒謬絕倫地說，中國新文學傳統的形成，就全靠這種所謂同人雜誌：“回顧一下，在新文學底發展史上，同人團體底戰績是很大的，抽掉了它，新文學史就差不多等於一張白紙（！）。同人團體造成了養育作家刺激作家的環境，由於它們底活動，由於它們底工作底相尅或相成，才形成了一個進步的新文學傳統，五·四的革命文學傳統（！）。”^①必須知道，當時正是開展文藝界大團結、醞釀成立各派作家的統一組織的時候，所以胡風的這篇文章，除了誣蔑歷史之外，還有一個破壞當時黨的文藝界統一戰綫政策的作用。

和他以後的主張一樣，胡風否認抗日戰爭前除了他自己以外的新文藝上的一切成績。胡風對抗戰前的文學創作作了一個極端反動的估計，說：“在九·一八以後到抗戰爆發前的這個期間，革命傳統的新文藝底經驗是非常艱苦的。……這個主觀和客觀的隔離，思想要求和生活實際的隔離，使現實主義的傳統同時遭到了危機。例如，在詩上面，或者是被壓抑的憂傷的低訴，或

① 見“密雲期風習小紀”，一九三八年漢口海燕出版社版，六七頁。

者是焦燥的愛國主義的喊聲；在戲劇上面，在小說上面，或者是直接从政治要求演繹出來的傳奇故事，或者是從社會科學常識出發的歷史底解題……。”而且，這些都是抗日戰爭前的“最主要的傾向”^①。反革命分子胡風的真面目在這裏是暴露無遺了！在胡風的嘴裏，革命文藝竟沒有一個字是好的，這不是百分之百的國民黨反動派的主張是什麼呢？不過，胡風比正面的國民黨反動派更狡猾、更毒辣，他以進步文學陣營一分子的面目，以保衛現實主義為幌子，因此對於進步文藝運動的損害，就遠比公開的國民黨的污蔑要大的多！誰都知道，從九一八（或一九二八年）到七七的時期，是當時中國自有新文藝以來創作上最活躍的時期，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的和接近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作品，都比以前大為增加，影響也大的多，而純資產階級的文學，在這時期已逐漸被革命文學打垮了，這正是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革命文學的歷史功績！這對於反革命的胡風當然如芒在背，就不得不以“左”的面貌和辭句來執行他的主子——國民黨反動派的“文化清剿”的任務了。這裏順便說說胡風在抗日戰爭前為什麼把他咒罵黨的與進步的作家的小冊子，叫做“密雲期風習小紀”這樣一個奇怪的名字。原來胡風與任何一個革命者的感覺根本相反，他把一九三五年“一二九”運動以後的全國性的革命高潮時期，稱作是像“密雲”籠罩下的“陰暗的時期”，說：“這期間的文壇，……差不多陷入了一種神經失常的狀態”^②，而他的書，就是紀錄他的敵人（進步文學界）在這時期的“風習”的。事情真是大出胡風的意外，這本書最後並沒有達到胡風的目的，現在倒成了胡風初期反革命陰謀破壞活動的“小紀”了！

① “關於創作發展的二三感想”，載“在混亂裏面”，一九四五年重慶作家書屋版，一〇頁。

② “密雲期風習小紀”，序言一頁。

和以後一樣，遍觀胡風在抗戰前的作品，找不着他在什麼地方攻擊過國民黨，甚至連“小罵”也沒有。有之，在他的一篇叫“反‘沙漠化’的願望”的文章中，胡風“批評”了國民黨查禁書報的“漫無標準”，超過限度。但國民黨要查禁“宣傳赤化”（即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書等等，則胡風明白地說：“在現在的社會裏禁書是不能免的事情”。胡風還裝着批評國民黨的樣子來替國民黨洗刷罪惡說：“從上面（指國民黨一些查禁書報的事實——引者），我不僅想指明政府對我們所表明的方針和執行機關底做法有很大的距離，而且我還懷疑（！）政府裏面有一部分人抱有統制思想的傾向！”^①請看，除了國民黨僱傭的最卑鄙的奸細，在革命陣營中怎麼能夠設想有人會講出這樣替國民黨辯護的無恥的話來呢！

這就是胡風在抗日戰爭前的真面目。

二

其次，我們來看看胡風在抗日戰爭的前半期（太平洋戰爭以前）的反革命理論活動。

胡風利用了抗日戰爭的爆發，來大大提高他的地位。八一三日寇開始進攻上海後，他立刻辦了“七月”雜誌，他利用這個雜誌來登載一些當時身在八路軍、新四軍根據地中的作家的作品（其中有些人就是胡風的信徒，常常在那上面發表一些內容有錯誤的作品），這樣，就在國民黨統治區造成了一個印象：胡風是革命的。又由於為了團結抗日的關係，黨所領導的進步作家們在這個時候也就不去談胡風在抗戰前的舊賬，青年們又不知道那些事情。這樣，胡風的“進步作家”的稱號就在這個時期比較穩

① 見“密雲期風習小紀”，一九〇頁。

固地騙得了。

胡風在这个時期的理論活動，主要的鋒芒仍然是對準着進步文藝界的。當然，這裏說“主要的鋒芒”其實並不妥當，應該說是全部的鋒芒。因為胡風不止一次地自己聲明過，他所批評的只限於現實主義或接近現實主義的作家，就是說，他只批評進步的文藝界。至於封建主義的文藝、資產階級的文藝、投降主義的即替漢奸宣傳的文藝、法西斯主義的文藝、色情加特務的文藝，所有這些在抗日戰爭時期在國民黨統治區存在過的反動和罪惡的東西，都不在胡風批評的範圍內。胡風以不屑於批評這些東西的面目出現，因而便在人們中造成了這樣一個假象：既然進步的文藝界，胡風都總是說它們不進步、不革命、不合“現實主義”、作家沒有“擁抱”客觀的“戰鬥精神”等等，那麼胡風之反對落後的和反動的文藝，當然就不在話下了！這正像胡風之並沒有反蔣，而却在有些人們中造成了胡風曾經反蔣的誤會一樣，人們以為：胡風既然天天罵共產黨的和非黨的進步作家，說他們沒有“戰鬥精神”，說他們是官僚、老爺，說他們墮落、妥協等等，那麼胡風的反蔣還在話下嗎？這裏，胡風的“戰術”倒很值得我們研究一下：為什麼胡風所沒有做的事，人們會以為他全做了呢？這就是胡風反革命戰術的狡詐之處了。原來胡風慣會這樣一種戰術，無以名之，暫時叫做“不在話下”戰術，或者“虛幌一槍”戰術，就是說胡風善於製造“佯攻”，而使得人們把他的“主攻”方向忽略了！例如，胡風對於上述那些落後的和反動的文藝，也不是沒有在某些文章中提到過一二句的，但是他提到的地方總是這樣：由於進步文藝界沒有他胡風的“主觀戰鬥精神”，所以通通都是“主觀公式主義”、“客觀主義”、“教條主義”、“機械論”、“庸俗唯物論”等等的“殭屍”、“墮落”、“蒼白色”的作品，因而就“加強了”、“幫助了”上述種種落後的與反動的文藝，因而進步文藝界就成了雙料

的罪犯，而胡風却就成了雙料的革命了。這裏，胡風對於種種落後的與反動的文藝的片言隻字是“佯攻”，對於革命文藝才是“主攻”！而我們因對反革命過於老實，就把胡風的“佯攻”信以為真了。其實，那是“疑兵”，是騙取人們的輕信的。這裏，給了我們一個教訓：革命者是唯心不得的，光有“仁愛的胸懷”是不行的，人們為什麼不去重視他每時每刻的實際言行，而卻去相信反革命的“不在話下”的“革命”的地方呢！

胡風在抗戰初期就暴露出了他不僅在文藝理論上，而且在政治上也是極端地和露骨地反動的。胡風在一九三八年八月寫了“論持久抗戰中的文化運動”一文，內中別的什麼問題也沒有說，只說了兩點意見，一是反對作家上前綫，二是反對作家寫作戰時題材：“民族革命戰爭全面爆發了以後，當時的文化界……主要的是被兩種態度支配着的。一個是，文化活動從此不關緊要了，文化工作者應該跑到前綫去，……但這在當時就已經被諷做了‘前綫主義’。還有一個是，我們是文化人，還得做文化工作，但現在是戰時了，我們底材料也得是戰時的，和戰爭配合……。如果我們不妨魯莽一點，就暫時把這叫做‘市儈主義’罷。”胡風又說，抗戰一年後，“文化上的進步，雖然是無計劃地，各自為戰地，在重重的困難下面取得的，但卻堅決地否定了前綫主義和市儈主義的觀點。”^①讀者看，胡風在這裏所說的东西，除了把它叫做百分之百的漢奸理論之外，還有什麼別的好說呢！這一個無耻的、冷血的民族的叛徒，在七七以後那樣民族抗戰的大高潮中，卻對民族抗戰懷着這樣的深仇大恨，胡風的痛恨中國民族與中國人民是到了如何堅決的程度！堅持這種意見的胡風到了一九四〇年還在繼續宣傳他的這種實質上的漢奸理論，反對文化工

① 見胡風抗戰後至一九四一年夏的論文集“民族戰爭與文藝性格”，一九四六年上海希望社版，三、四頁。

作者为前线服务，他說：“在一种原始的兴奋裏面把战争当作简单的机械的军事过程，幾乎完全否定了文艺底任务。最明显的例子是一部分作家所提出的‘投笔从戎’运动，一些論者把那叫做‘前线主义’。”^①

胡風把抗日战争时期的文艺运动分为几个阶段，在武汉失守以前为抗日战争的初期阶段，胡風是这样地“总结”这一阶段的特点的：“这时候的创作特徵，就一般的情形說，主要地表现在主观精神底高揚和客观精神底泛濫分离地同时发展这一点上。”这一段胡風的咒語，單从字面上是無論如何也弄不清楚他在說什么的。实际上，这段话就是攻击作家为抗战事业服务。不过这里需要一番費力的註解工作。这里的“主观精神”，据胡風的解釋是这样的：“文艺家和这偉大事件（指抗战的爆發——引者）相碰，他底精神立刻兴奋起来，燃燒起来，感到拥抱了整个时代的沉醉。”就是說，这指的是抗战的热情。但是胡風对这个时期作家的这种“主观精神”却討厭得很，他接着就說：“在主观精神底这样的高揚里面，现实生活底具体的内容就不容易走进，甚至连影子都无从找到。”^②讀者看，胡風並不是对什麼“主观战斗精神”都拥護的，胡風要的僅僅是一种“主观战斗精神”，即反革命的“主观战斗精神”，而革命的戰鬥精神，例如，这时候作家們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戰鬥精神，胡風就是深惡痛絕的！以上就是胡風所反对的“主观精神底高揚”。

所謂“客观精神底泛濫”又怎样解釋呢？看胡風說的罢：“於是，飛來了种种的政治号召，他（指作家——引者）立刻被这些号召本身吸住了，觉得每一个号召本身都是抗战内容底全部，变成

① “民族战争与我們”，載“民族战争与文艺性格”，六五頁。

② 引文均見“文艺工作底發展及其努力方向”，載“逆流的日子”，一九四七年上海希望社版，二——三頁。

了它們底直接的傳佈者，……在客觀精神底這樣的泛濫裏面，很難看到文藝家自己，很難看到文藝家自己的精神力量。”^①問題就很清楚了：胡風的所謂“客觀精神底泛濫”，还是指的作家不應該反映抗日戰爭，不應該從文藝上來投入抗日戰爭。現在所謂“分離地同時發展”的咒語也就弄清楚了：揭穿黑幕都是反對作家投入抗日戰爭！讀者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胡風的這一段莫測高深的咒語，剝開皮來看，原來又是為日本侵略者所歡迎的理論。在這些時候，國民黨的梁實秋也正在宣傳和徵求與抗戰無關的作品，胡風在這裏所作的，不是別的，正是與張道藩、梁實秋等人裏應外合的“挖心戰”！

然後胡風就根據這個反革命的理論，去否定那個時期的一切的作品（不，這回有一個例外，胡風大捧了一下“詩”^②。秘密何在呢？原來胡風本人除了會寫“理論”文章之外，還有一個本事，就是會寫反革命的長詩，而胡風集團和“七月”雜誌上“詩人”又特別多，胡風一直誇耀，“七月”共出現過三十九位“詩人”，而路翎的小說這時又還未上市，因此，這時就只有胡風派的“詩”是好的，其餘的都糟透了。）：“在敘事文學方面，情形就比較不同了。……絕對大多數的作家們，却陷進了這種生活現象的情形里面。他們把握不住紛至沓來的生活事件底內容，因而出現了相反對的兩種情形：一方面是厭棄了戰前的空虛的虛構性，小說底產量非常少，一方面是那種虛構性更加擴大了。戰爭創造了無數的神話似的‘故事’，有的作家也就記流水賬似地把那些故事寫進了小說的形式里面。”而戲劇方面，由於直接負擔了教育羣眾的作用，“因而雖然作家正面地對着了生活，但却更加强

① 引文見“文藝工作底發展及其努力方向”，載“逆流的日子”，三頁。

② “關於創作發展的二三感想”，載“在混亂裏面”，一一頁。因文長未引原文。

了直接从政治要求出發的傾向”^①。胡風就是这样明目張胆地否認了抗战初期一切为抗战服务的文藝作品。

除此之外，胡風在一九三八年又以最惡毒下流的話，反对过郭沫若先生關於強調抗战中普及工作的重要性的主張。郭沫若在一九三八年初，曾經寫文章号召：要把“一切文化活動都集中在抗战這一點”，要求“充分的大众化，充分的通俗化，充分的產出多量的成果”；並說不要用和大众“絕緣”的“高深”的理論和“卓越”的藝術去妨碍了抗战的動員。这事又非常地激怒了胡風，說这是“愚民政策”、“公式主义”，是把人民当“玩具”等等。究其实，胡風在這裏所反对的，仍然是反对对人民進行抗战教育，反对普及工作，因而胡風又用他的慣於迷惑人的話說，“提高”的任务被“初步啓蒙的教育‘普及’工作所淹沒了”^②。

在一九三九——四〇年，胡風又大事反对進步作家的所謂“邏輯公式”，提出什麼，今天：“首先，要从邏輯公式的平面上跨過”的咒語！胡風为此寫了一篇完全反動的叫做“今天，我們底中心問題是甚麼？”的長文章。胡風是抓住了兩位作家來發揮他的反動理論的。那兩位作家，一个提出了創造抗战的積極人物的典型的意見，另一个提出了如何創造典型的一些注意點。胡風却借此大做文章，罵一切進步作家都是从“邏輯公式”出發寫作品，說宣傳恩格斯的“典型环境裏的典型性格”的提法是“圖解式的、死的東西”，乘机大大宣傳他的作家只要有“戰鬥意志底燃燒，情緒底飽滿”就能寫出好作品的理論，並說進步的作家和批評家們“對於生活的‘漠不關心’不僅是从脫離生活而來，同時也从搶奪思想概念而來。他們把思想概念看作一面大旗，插在头上

① “關於創作發展的二三感想”，載“在混亂裏面”，一一、一二頁。

② 本小節引自“論持久抗战中的文化運動”一文，載“民族戰爭与文藝性格”，一七——二三頁。

就可以嚇軟讀者的膝蓋。旗子是愈高愈好，於是他自己也就騰空俯視了”。同時，在這篇文章裏胡風又宣傳了藝術即政治，“創作的來源”是作家對待生活的“主觀精神”的態度（這些問題後面再談）等等。這一篇文章是胡風第一篇有系統的、比較過去更為全面地反對馬克思主義、宣傳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的反動文章^①。

胡風在這一時期最大的一次反動的理論活動，是一九四〇年冬對“民族形式”問題討論發表的自封的“總結”。胡風為此專門寫了一本書，叫做“論民族形式問題”。這是一本反民族、反愛國主義、反對通俗化大眾化的極端反動的小冊子。它的中心目的，是為了反對毛澤東同志關於反對洋八股、反對教條主義、提倡中國作風與中國氣派的指示。毛澤東同志在一九三八年中共擴大的六中全會上的報告中說：“洋八股必須廢止，空洞抽象的調頭必須少唱，教條主義必須休息，而代之以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毛澤東選集”，第二版，第一卷，五二二——五二三頁。）這個報告發表後不久，在延安和在重慶的很多著名的黨員作家和進步作家，都熱心地擁護和響應了毛澤東同志的指示，踴躍地寫文章來探討和體會這一指示的豐富內容。當時除了個別與胡風意見差不多的人以外，絕大多數人的文章都是在这一指示下面進行着有益的探討和發揮，而且都發表了或多或少的正確的意見，這是一個很可喜的現象。但是胡風忽然出來毫不客氣地做起“結論”來，把當時所有參加討論的幾十個人通通臭罵一頓，說所有這些人的“所有這一切錯誤的理論，都是由於根本不懂得現實主義”^②！

在這本小冊子裏，在一切裝模作樣的“現實主義”、“五四革

① 本節引文出自“今天，我們底中心問題是甚麼？”一文，載“民族戰爭與文藝性格”，一〇〇——一二三頁。

② “論民族形式問題”，海燕書店版，七二頁。